

蔣介石的基督教思想：脫離實際的樂觀主義？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

盧溝橋事變中日軍內虛中乾？

每逢暑期，許多日子都觸動了中國人的歷史傷痕，例如五三濟南慘案、八一三淞滬之戰、七七盧溝橋事變、九一八瀋陽事變。最近筆者走到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，翻查了在七七事變前後蔣介石日記中寫下的東西，發現了好幾樣值得深入研究的事情。

首先，在盧溝橋事變之前蔣介石將注意力放在中國和蘇聯的衝突，在七月七日當天，他在日記只是提及和蘇聯、英國的外交問題，在盧溝橋事變之後，他並不相信日本有意全面侵略中國，他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倭寇此時無與我開戰之利。」在七月九日雖然他提及對付日本，要積極運兵，北上備戰，但他繼續將視線集中在蘇聯和英國上面，他在日記中寫下的注意事項為：「對俄之交涉、英國借款條件之研究。」在七月十日蔣介石意識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，他說：「我不有積極準備，示以決心，則不能和平解決。」

不過，在抗戰初期蔣介石低估了日本人的決心和實力，亦高估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。在七月十一日他寫道：「倭政府……準備兩師，開動了關東軍入關等形勢，以余觀之，皆為內虛中乾之表示也，暴露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。」之後，他試圖通過英美的調停和顯示國軍實力去化解危機，在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自豪地說：「玩弄強敵倭寇於股掌之上，彼之進退維谷。」一天之後他說：「倭寇入冀部隊進退已失去自由，全為我治制矣……以後無論是和戰，精神戰爭已屬於我。」但隨後日軍繼續進攻，威脅北平，在七月二十七日蔣很有信心地預料北平必能固守，但前綫官員反而知道現實，山西省主席徐永昌悲觀地表示：「平津之失與不失，只恃敵之來與不來了」。

日本空軍技術低劣？

兩天之後平津失守，七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倭寇隨手而得平津，殊出意料之外，但是今日得之也易，安之他日失之也亦易乎？此或天之意。」用廣東俗語來形容這種心態，就是「跌在地上也要抓一把泥沙」。在八月二日蔣介石勸誡自己要小心「驕矜漸萌」，可是，在八月九日他又故態復萌，他認為：「倭寇政界與戰界自佔領平津之後，已陷入於極度不能自拔之境，勝算已操於我矣！」在八月十三日他預測「倭寇戰爭持久時期約為一年」。一天之後，他對一場空戰勝利大書特書，他指出：日本損失了十七架飛機，而國軍只是損傷了三架，他以嘲諷的口吻寫道：「倭寇技術之劣，於此可以（見到）。」以上評論是典型的以偏概全，蔣只是以其中一場戰爭的結果去貶低日本空軍的力

量，其實，在二次大戰之前和期間，日本空軍是世界一流的，在遠東戰場，日本零式戰鬥機把英國的噴火式戰鬥機打至毫無還手之力，日本戰機被喻為空中的「銀色子彈」，到了一九四一年中國的海軍戰艦和空軍飛機幾乎被日軍全數殲滅。

日軍萎靡怯弱、恐慌萬分？

在八月，蔣介石為了打亂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路線，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，於是在上海開闢新一場戰役，史稱「淞滬會戰」，戰爭在八月十三日開打，在八月十二日蔣介石躊躇滿志地說：「上海倭寇恐慌萬分。」八月二十一日他又犯了輕敵的毛病，他說：「倭寇使用兵力甚為節省，不肯犧牲。」事實上國軍漸漸陷於被動，但在九月四日蔣介石仍然樂觀地說：「滬戰當可持久，敵雖再增三個師團，亦無能為力也。」在三天之後，他繼續說：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三者皆為我軍歸有，敵國焉何而不敗乎？」在本週反省中他寫道：「需知敵軍優長者為飛機與砲兵而矣，日本兵之怯弱不堪言狀，然而戰場攻戰之主兵乃在步兵，以我精勇之步兵，而對抗敵軍萎靡怯弱之步兵，必可操最後之勝利。」

蔣介石所描述的中日軍隊質素之差異，跟我在歷史書中所學到的很不一樣。日本軍隊以懷著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的決心而見稱於世，在二次大戰時日軍戰意高昂，往往寧死不降，例如在一九三九年至四零年的崑崙關戰役中，中國第五軍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才取得勝利，最後百分之八十五日軍戰死沙場；在一九三九年蘇軍和日軍爆發了諾門罕之戰，蘇軍讚揚「日本基層士兵的戰鬥意志和戰鬥素養極其優秀」；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逐島躍進，遇到了日軍的頑強抵抗，在硫磺島一役中，日本約有二萬二千名守軍，最後除了約一千人被俘之外，其餘全部陣亡；在二戰後期日本甚至組成神風特攻隊，以自殺方式衝向美國戰艦。蔣介石貶日軍為萎靡怯弱，真不知從何說起？蔣介石曾經在日本留學，一九七零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編撰的【蔣總統秘錄】，甚至說日本是蔣的「第二故鄉」，照道理蔣中正應該對日本的國民性格有一點了解，他如此輕看日軍，實在令人莫名其妙。

台兒莊大捷顯示日軍已成強弩之末？

相反，蔣中正高估了國軍，平心而論，當時國軍的素質和軍紀都比不上日軍，在上海之戰後，蔣介石亦承認這事實，他寫道：「一般將領頹喪太甚，士氣不勝，搶劫日多，此乃致命之傷也！」他又指出：國家的庫房原本是用來支持抗戰的，但反而成為散兵游勇搶劫的目標，「此乃戰前未曾想到之事」，國軍敗退時，退兵「搶劫姦淫，毀壞軍紀」，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他甚至指出國民黨軍隊「任意拿用對外公私物品」。

在十月下旬，淞滬之戰已經接近尾聲，國軍逐漸撤出上海，只留下謝晉元團長率領的「八百壯士」，死守四行倉庫。在十月二十六日，蔣中正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對內對外之宣言：滬戰未列入整個抗戰計劃之內，一時與局地之損失，無關全局之勝敗。」在淞滬之戰

中，國民政府出動了七十萬大軍、一百八十架戰機，蔣中正甚至派遣了自己的嫡系部隊赴戰，但最後上海失守，國軍犧牲了二十萬將士，而日方只有兩萬人陣亡，不消說，蔣介石的說話無非是安撫人心和自我安慰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四月國軍在山東省南邊台兒莊戰勝日軍，史稱「台兒莊大捷」。五月十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：「敵寇果成了強弩之末乎？」他甚至認為台兒莊的勝利會打亂了日本企圖侵略蘇聯的計劃。在七月三十日蔣介石再次表達出輕看日軍和對抗戰的樂觀態度，他說：「甲午戰爭、日俄戰爭，幸勝也！此次戰局已逾一年，而倭寇弱點破綻竟暴露大部，小寇氣短量窄，決不能持久也！」

「接收」變成「劫收」

總體來說，在抗戰初期蔣中正漠視日軍處於優勢的現實，誤以為日軍是懦弱無能的「水兵」，另一方面，他又高估了自己的能耐及國軍的作戰能力，稍獲小勝便沾沾自喜，面對大敗卻文過飾非，我們不能因為抗戰取得最後勝利，而不去公正地評論蔣中正的性格弱點。

筆者認為，這種脫離現實的樂觀，亦是後來他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原因之一，就好像在抗戰初期輕視日軍一樣，蔣介石也沒有將共產黨放在眼內，一九四六年五月，國軍在四平戰役得到初步勝利，蔣中正說：「中共除一部分外，本屬烏合之眾，經此次打擊，勢必瓦解無疑。」一九四七年六月，蔣介石充滿信心地說，「綜覽各方之情況，一切可能之條件，皆操之在我，我欲如何，即可如何」。在上面提過，在八年抗戰期間蔣介石高估了國軍的素質和紀律，即使是國難當前，國民黨軍隊中腐敗和自私者大有人在，但蔣介石並沒有嚴謹地處理這個問題，這「致命之傷」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後，日本投降後，國民政府接收被日軍佔領的土地，一些國民黨接收大員卻搜刮民脂民膏，「接收」變成了「劫收」，當時的民謠有云：「盼中央，望中央，中央來了更遭殃！」難怪當時國民黨失去民心。

弱點同時是優點

有趣的是，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往往人的弱點也同時是他的優點，蔣介石的樂觀態度是不設實際的，但正正是這種盲目的固執，中國才能夠堅持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。當時中日軍力懸殊，在珍珠港事變和美國介入二次大戰之前，中國大有可能會一敗塗地，而事實上當時許多中國人都認為中國沒有本錢對抗日本，故此選擇寧為瓦全，不作玉碎，例如和日本合作而成立偽政府的汪精衛，不開一槍一炮而放棄山東的韓復榘。但蔣介石力排眾議，堅持到底，他在日記中屢次強調，許多文人、政客、軍事將領都主張和日本議和，殊不知議和就等於投降和自取滅亡，戰爭固然痛苦，但在強權之下的和平卻比戰爭更痛苦，在這方面的洞悉，他的眼光比當時許多西方人更有深度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吞併了奧地利，並且準備侵佔捷克，而西方國家企圖通過和談去避免歐洲爆發全面戰爭，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用不以為然的口吻寫道：「英首相張伯倫突乘機赴德訪希達拉，英人避戰求和之心有是者也……捷克問題，戰爭無法避免。」張伯倫和希特拉所簽署的就是「慕尼黑協定」，回到英國之後，張伯倫自豪地說：「我從慕尼黑帶回了榮譽與和平。」但不旋踵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便瓜分了波蘭。納粹德國的確實力雄厚，如果以客觀條件來衡量，當時張伯倫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，在二戰期間，蔣介石是極少數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勇者之一。

基督教信仰深深影響蔣介石

蔣介石這種近乎天真的樂觀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？筆者瀏覽了不少對蔣中正的評論，我發現大多數學者都集中分析中國文化（特別是王陽明哲學）對蔣介石的影響，例如中國大陸學者陳鐵健、黃道炫，但很少有人提及基督教信仰在蔣介石思想中扮演的角色。有趣的是，在蔣介石日記中他經常以基督教的格言來勉勵自己，而基督教的核心精神之一是：縱使在完全沒有盼望的情況下，信徒仍然要對上帝保持信心。以下是一些日記中的摘錄：

「今日得聖靈指示【以賽亞書】六十二章七節，惟願上帝佑我中華抗倭。」（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）以賽亞書記載：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，他們晝夜必不靜默。呼籲耶和華的，你們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。」似乎蔣介石將中國比喻為耶路撒冷，既然上帝保守其選民以色列，祂亦會保守中國。

「竭盡心力，深信上帝必不負余夫妻之苦心也。」（八月十日）

「惟信仰可以移山。」（八月十七日）這是【馬太福音】十七章二節的撮要：「耶穌說：『是因你們的信心小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：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『你從這邊挪到那邊！』，它也必挪去；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』」

「上帝自有主宰，何憂何懼？」（八月二十一日）

「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穩。」（十月一日）這是徵引自【哥林多前書】十六章十三節：「你們務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穩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剛強。」

「願主基督無時無地與我們同在。」（十月四日）

「篤信上帝必救夠我中華脫離危險。」（十月二十二日）

「信心生忍耐，忍耐生成功。」（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）這是源自【羅馬書】五章三至五節：「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。」

「順從上帝，抵抗魔鬼。」（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）這「魔鬼」應該是指日本帝國主義。

「天父選擇世界上目為弱小之人，使能戰勝一切蠻力。」（三月十六日）這是出自【哥林多前書】一章二十七節：「然而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為了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；神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為了使那些強壯的羞愧。」

「凡信賴上帝真理之權威者，必能戰勝一切。」（三月十七日）

總括來說，在基督教思想的薰陶下，蔣中正深信真理必勝，由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五日，蔣中正重複提及真理：「真理常存，強權必滅……以精神與真理察之，倭寇未有不敗之理……認識真理，至死不變初衷，則成矣！」這種精神促使他堅持抗日戰爭，令中國避過一劫，但同樣的態度也令他在日後失掉大陸，人生就是充滿吊詭！

2017.5.7

創豪弟兄：

拜讀了你的文章：〈蔣介石的基督教思想：脫離實際的樂觀主義？〉

月前得 Jeremy 送來原文，初讀時有一些即時的感受，原想寫信給你作點回應，但因事忙，始終未能下筆，週一(26/6)與你見面時略作提起，誰知你仍有興趣想和道我的看法，那麼就讓我談一談，但我的意見全屬直覺，沒有深思熟慮、詳細考據，故此你只需略讀即可，若不同意就作罷，不要過份認真。

知道你為了寫這篇文章，曾到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，細心翻閱蔣介石的日記，特別是七七抗戰後一年的日記，為你的努力感到佩服。

本文頭幾段，你引用蔣介石在日記中的感言，去描繪這位中國第一領導人的內心世界。我們先來一個假設—就是蔣介石這些日記，都是他對自己的真誠剖白，不是打算將來會給世人閱讀的，故此他無論如何寫法，都代表他在那特定的時空對世情的看法。

基本上作為評論者，你能從蔣日記的字裡行間，看出他的自傲個性及評估一眾敵人重要性的先後排序，有相當透切的了解，往後你並指出，因為他對不設實際的樂觀態度的執著，導至中國能堅持長達八年之久抗日戰爭。

個人認為你寫在抗戰初期，蔣介石的抗日心態很明確—即他在態度上一向看輕對手，並認為日本絕非中國對手，他將自己的感受寫在日記內，基於上文的假設，我們相信蔣介石那時真的滿懷自信，但當日軍步步進逼，國軍卻節節敗退時，蔣卻仍然屢敗屢戰，並給自己的失誤找藉口；偶然取得一兩次罕有的勝利(如台兒莊大捷)，即在日記中推測：「敵寇果成了強弩之末乎？」

為了去理解為何蔣介石如此樂觀，首先我們要了解那些年的形勢—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，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，已經由廣東打至武漢、南京、上海，席捲了半個中國。北伐戰爭隨著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東三省宣佈「易幟」，至此中國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，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。故此由一九二九年開始，中國統一，蔣委員長成為了國民政府的最高領袖。

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，蔣介石基本上主宰了全中國的命運，以 40 歲剛出頭的他，自己對前途滿懷自信，他並清楚知道共產黨是他的心腹大患，故此雖然知道日本人的野心，也情願忍辱，不與日本正面衝突，反而對打擊共產黨人卻不遺餘力，若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「西安事變」，蔣介石不會主動提出抗日，西安事變之後，蔣同意國共兩黨再次合作，攜手抗日，並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因盧溝橋事變，正式向日本宣戰。

但蔣介石其實在北伐中期已宣佈「國共分裂」，以清黨名義剷除共產黨，故此今番再度合作，雙方各懷鬼胎，蔣介石的日記若不是謊言，則顯出他其實不知己不知彼，正如你所說，他高估了自己的實力，也同時低估了敵人(包括日軍及戰後的共產黨)的實力，故此有你文中的觀察，顯示出他經常對自己的實力的評估，過分樂觀。

毛澤東語錄有一佳句，我時刻銘記於心：「**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，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。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，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…**」

蔣介石卻只是實踐了第一步，永遠藐視一切敵人—先是日本、繼而是共產黨。但對個別的戰爭，坦白說蔣實在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領袖，尤其是對著知彼知己的毛澤東，蔣的軍事優勢被毛的游擊戰，逐步蠶食，最後在三大戰役(遼瀋、平津、淮海)之後，形勢逆轉，國民政府處於劣勢，最後只能退出大陸，避居台灣。

若說蔣樂觀執著的態度是導至中國八年抗日勝利的主因，未免將事情看得簡單化。坦白說八年抗戰，中國與蘇聯同為被侵略國家，相比上蘇聯能獨力殺敗德軍，他們堅守莫斯科、史達林格勒及列寧格勒，不單頂住德國的進攻包圍，並且後期能擊敗德國遠征軍，組織反攻，最後成為首個殺入柏林的國家。

反觀中國，其實與日本宣戰後，戰爭輸多贏少，首都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已淪陷，國民政府只能避居重慶(聲稱陪都)，中國的軍火是否自行製造我不清楚，但肯定大部分是由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供應。中國從未反擊過日本(在日本領土上作戰過)，它的主要作用是拖著日本的後腿，由於地大物博，日本又未能速戰速決，打持久戰是日本的大忌，但堅韌精神是日軍的本錢，若非美國投放了兩個原子彈，日本和中國的對峙，不知還要到何時才結束。

及後你開始講蔣介石的基督教思想對他的影響。問題在於這是整篇文章的主題，但坦白說在篇幅上其實只佔兩頁(全文有六頁)，單看頁數已覺基督教信仰對蔣之影響落墨太少了，不成比例，無法特顯他的信仰如何影響他行軍遣將的本領，無疑你從日記中所引用的金句，可以看出聖經的話語是他的精神支柱，支持著他去對付敵人，並深信「真理必勝」，無奈引用毛語錄：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」，而「戰爭也絕不能只靠聖經金句作為勝利的支撐」。蔣介石抗日能逃過一劫，主要是日本開闢戰線太多，尤其是與中國打了四年後，又偷襲珍珠港，導至美國向日本宣戰— 1943年美國開始反擊日本，1944年6月佔領塞班島，由於該島接近日本本土，可以讓轟炸機由該島直飛日本作轟炸，加上航空母艦的配合，日本領空的制空權已落在盟軍手中。但其實所謂戰勝國中國在打敗日本的過程中，直接貢獻有限。中國與蘇聯這兩個亞洲大國，在擊敗對手(日本和德國)的表現，絕不可相提並論。

更不幸抗日勝利，念蔣委員長以為「真理必勝」是一定的，只要有美國撐腰，國共內戰，肯定國民政府是勝利的一方。因為抗日戰後國民軍無論在兵力、財力都遠比共軍優勝。但一仗一仗的打，蔣介石無論如何不是毛的對手。況且在中日戰爭中，美國為了要打擊日本，義無反顧支持蔣介石。但國共內戰時，當美國發覺國民政府的腐敗，它及早抽身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！沒有美國這個靠山，國軍已無心(也無銀)戀戰，加上政府高層貪污，經濟崩潰，國民政府失掉大陸，還會是意外嗎？

所以我不明你文章中最後幾句的意思—「這種精神促使他堅持抗日戰爭，令中國避過一劫，但同樣的態度也令他在日後失掉大陸，人生就是充滿吊詭」？因我認為，蔣從來未有改變他的人生觀，他勝日本而敗於國共內戰，實在有很多其他因素。並非簡單一句「人生就是充滿吊詭」就可以作結論！

總的來說，我認為若能在基督教信仰(思想)如何影響蔣介石，導至他變成脫離現實的樂觀主義者，多加論述的話，將可大大豐富本文的可觀性，未知你同意否？

祝好

主內

義鴻

七月一日

多謝義鴻兄的寶貴意見，任何事件都有多種原因，在一篇文章中，我只能專注於一個主題，愚見是，領導層的決心是處理軍事衝突的主要關鍵。另外，與蘇聯軍隊相比，國民黨軍隊的表現當然很差。但是，與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向納粹投降的法國相比，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實在令人欽佩。